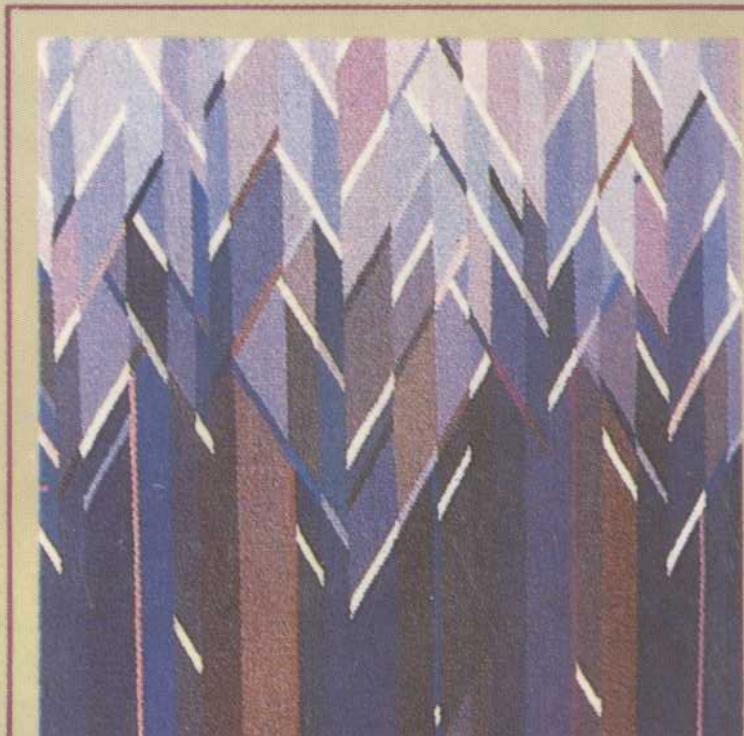


袖珍系列 105

西蒙波娃 這個人！



編譯／久大編輯部

▲ 久大文化

傳記⑬

袖珍系列105

西蒙波娃這個人！

久大編輯部 編譯

久大文化

西蒙波娃這個人！

編譯 久大編輯部

執行編輯 鄭惠今

發行人 張英華

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三八五號五樓之四
(02) 7763140

總經銷

新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三七一七號
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訂書專線

台北市敦化南路三九二號九樓之五
(02) 7763141
(02) 7720433
七一二五四五

傳真機

(02) 7763141
(02) 7720433
七一二五四五

排印再定

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刷版價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印版

一九九一年二月

刷版

八〇元

ISBN 957-41-0129-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 錄

- 一、時代的啓示
- 二、先驅者的成功之道
- 三、《第一性》的影響
- 四、重讀《第一性》
- 五、實踐中的先驅

一、時代的啓示

她是我們的母親，也是我們的姐妹，並且是我們當中的姣姣者。她的名字成了婦女運動的口令和號召。一位六十年代讀過她的作品的日本婦女說，「那本書令人震驚，讀後渾身起鷄皮疙瘩」。她的作品激勵著千百萬婦女投身於女權運動，其中的大部分人同她一樣，都是中產階級的白種人。然而，在八十年代，其後的那一代婦女，在婦女解放運動興起後的十年中，享受了不少生活的樂趣，對她作品的反應就不同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不論是在西方世界還是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區，西蒙·波娃的《第二性》都被奉為女權運動的教科書，而現在的許多處於相應地位的年輕婦女，卻從未讀過這本書。還另有些人則承認只對該書隨便瀏覽了一遍，覺得索然無味。她們沒能像我們這一代婦女那樣從這部作品的字裏行間悟識出自己的影子。有些年輕婦女看了這本書竟

然怒不可遏。在一次波娃書題討論會上，我聽到一位年輕婦女指責她「使婦女解放運動後退了好幾年」。似乎只有少數較年輕的女權運動者，把她的作品看作是一如既往的鼓動力量。

對於在六十年代以及後來才上學的這一代人來說，要求波娃的創作應當與他們可能進行的創作如出一轍，那真是幼稚可笑的。但是根據後來的情況變化，而對她的部分觀點加以細辨和剔除，則是完全正確的。要評價波娃的作品，就必須重讀幾遍。在波娃作品發表的時代中，以及在女權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萌芽之前去閱讀她的作品，較之在數十年後去閱讀同一作品，反響是不同的，原因若不是在於她早期的讀者自身發生了變化，就是在於換了一批讀者。

當前，一批新興的學術刊物有貶低波娃作為女權運動作家的傾向。而另一方面，儘管她是女性，卻又正被尊為「存在主義學派的鼻祖」或「文體新穎的小說家」，並因此像知識界中一位負有盛名的男子一樣，更負衆望。一位美國學者對我們所說的下面這段話，說明她真是達到了名符其實的地步：

不論哪個男批評家有什麼樣的焦慮，西蒙·波娃都能使他心平氣和。要不是她不斷地為婦女事業而呼號吶喊，那麼她那精彩的演講，她那清新的著作，也許會使人們忘卻這位小說家和散文家的性別。

同時，人們讀她的自傳並非單純要了解她的生平，而是想得到有關她那著名的男伴侶保爾·沙特的更多情況。當學術界忙於對她進行研究時，女權運動的理論可能也同時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本書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評述波娃多產的作品，而把重點放在她對婦女的鼓舞作用方面。我們當中有些人正是按照她的模式來規範自己的人生的。一九六一年，我還未滿二十歲就第一次讀了《第二性》一書和她的《回憶錄》，因為當時還沒有其他有關女權運動的教科書。當我結束在英國一所寄宿學校的修道院式生活之後，在離家赴巴黎深造的前夕，我母親把J·S·米爾寫的《婦女的隸屬地位》一書塞進我的行李箱。但不論是這本書還是肖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知識女性的指南》，都不像波娃這個女作家的作品那樣，在我的心靈引起了共鳴。幾年後重讀她的作品，我驚訝地發現，自己有意無

意地從《第二性》一書中，不知吸收了多少警世箴言和思想觀念。雖然其中一些觀念已不再那麼符合時尚了，但它們已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波娃的觀念對許許多多的婦女也產生同樣的影響。西德作家阿麗絲·施華澤談到波娃的影響時說：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迷茫之中，新的婦女運動尚未興起，《第二性》一書就像一份密碼一樣，被我們這些異軍突起的婦女們，用作彼此溝通信息的媒介。西蒙·波娃她本人、她的生活以及她的作品過去曾經是一——現在仍然是——一種象徵（一九八四，P·13）。

這一新的評價將發揮六十年代初期，那種對波娃作品的早期閱讀之影響，同時將提供一個證據，並表達一敬意。想通過正式的調查而準確地反映其他年輕婦女是如何地理解波娃的作品，這是不可能的，而我則可以提供一切可能獲得的事例。從這些事例以及和我們這一代的熱心者所進行的交談中，我發現我們的相似之處體現在我們的熱情之中。戰後西方出現的一般歷史狀況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使我們得以把互不相關的個

人反應，根據歷史時間的前後加以分類。伊麗莎白·威爾遜描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這段時期內，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特殊巧合，如何創造出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難準確地描述或清楚地了解婦女所受的壓迫。」（一九八〇，P. 207），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也許我的觀點同英國和美國部分地區的中產階級白種人的反應更為一致。

今天，由於在普遍性的要求中隱含著一種歐洲狂的偏見，使得波娃所作的分析遭到了貶低。但是，這種局限反而顯示了《第二性》一書在第三世界讀過此書的婦女中所享有的威力。一個中東婦女的話證明了這一點，她以為波娃的作品正是向西方發出的一種別具一格的抨擊：

對我們這些（在六十年代還只是十幾歲的）青年人來說，讀點歐美文學是擺脫多少帶有不幸因素的現實的一個最佳辦法……我們一方面在自己的國家裏受過道道地地的西方教育，另一方面又身為婦女，經歷著一個與我們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完全相反的現實，結果普遍產生了一種「但願父母生我為男子」的退想。對我

們來說，西方就是理想社會的典型，它同傳統社會強加於婦女身上的種種難以忍受的壓迫是格格不入的。……我們對神奇的西方世界的信念，一直延續到文藝批評的浪潮洶湧而至時才開始動搖——而西蒙·波娃則正是這股潮中的一朵浪花。

我們中只有少數人讀過她的作品，她被認為過於理智，因此成了衆矢之的。她對自己筆下理想的典型提出質疑……她既能解釋我們婦女的感情和經歷，同時，又打破了我們對西方的神秘感。突然間，我們開始從婦女受迫害的角度來看待西方了……這與我們分析家庭問題的出發點正好一致。……她使我們確信，不能因為我以某種方式表達思想和情感，就說我們一向是「傻瓜」。她還揭示了改變婚姻和生育觀念的可能性。她本人則成爲崇拜的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她還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既「反帝」又爲了女權運動而同時「親西方」的矛盾。

另一個例據來自末嘉·古伯塔。六十年代她在她的出生地加爾各答讀過《第二性》。她的母親原先是穆斯林教徒，講烏爾都語。她的父親是孟加拉人。「他們早就幾乎完全被殖民主義的思想同化了」，因此把她送到愛爾蘭的一家修道院去學習。在那裏

她學會了講英語。她說：

這個作家似乎是完全陌生的，這種陌生感是我從別的英國作家身上所感受不到的。但是這種陌生感又含有我們所共有的天主教和中產階級教育的特點。我還記得，當時覺得她的話有種力量。她好像了解我的感情——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認識，不如說是一種欣慰，因為認識到我和我的女友們在同一「男孩子」交往時所感到的「彆扭」，並不是孤立無助的……同時我也覺得她與衆落落寡合，……驕傲自大。我這個文化界的「冒牌貨」所感受的體會，很難在她書中找到立足之處。我記得對這幾句話感到反感：「她人倒是不錯——她的天才贏得了男人的支持。」我的經歷是與世隔絕的經歷。波娃從來不提倡以婦女的團結一致作為鬥爭的策略。她常用「信仰不篤」，我覺得這句詞很損人，因為說這話的人無視一個人的出身背景，即其文化背景。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她的驕傲情緒也與日俱增，因為我知道這是值得探討的。我該感謝這些記憶，波娃使我們想到文化背景和階級地位，儘管她也許並不把它們

當作一回事了。

在概述我自己和別人以往對波娃作品所作的反應時，我認為個人的事例只能說明為較廣泛的討論中的一部分。對個人經歷的描寫，不僅僅是這位作者特有的風格，而且，她所寫的具體細節，還能幫助我們了解在一個特定時代中婦女階層的特異性。閱讀是作者與讀者間的主觀聯繫，這種聯繫部分是由歷史形成的，部分是由讀者的特殊性形成的，其中讀者的性別、階級、種族和文化屬性以及年齡都很重要。有些範疇，比如性別，是固定不變的，其他的諸如文化等屬性則是可變的。每個人的經歷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波娃作為一個細心觀察婦女狀況的女作家，從生活在特定時代的許多女讀者中，引起了特別強烈的反應。在婦女讀者眼裏，她就像母親、姐妹一樣，有著成年人複雜的情感，也有著與這些關係必然並存的怨恨情緒，而幾乎沒有什麼冷漠的心理。為了重視那個年代，我對當時年輕女讀者天真幼稚的心理狀態作了一番描寫。一些反應，在今天看來似乎是荒誕可笑的，但是讀者的主觀體會也是對客觀條件的一種反應。這些客觀條件從那時起就已開始變化了。

八十年代，人們對波娃作品的理解受到新近女權運動知識復興的影響。當前有一大批關於婦女和性別等許多方面的作品，研究婦女問題的專門學科欣欣向榮；對婦女的研究也滲透到學術、人文和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裏，使得你不可能再跨越專題的領域而夸夸其談了。在波娃時代，她的作品就在生物學、歷史學、文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人類學和哲學各門學科之間縱橫馳騁，今天再也沒有任何人敢像她那樣雄心勃勃了。

還有一些其他的變化，有助於解釋年輕一代為什麼與波娃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原因。

西方社會的女權運動，在某些問題上的鬥爭有所突破，那些問題現在則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了。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較年輕婦女正處在「滿足的時代」。儘管最近由於政治權利問題而產生了強烈的反映，但原則上人們不必再去爭論婚前貞潔、避孕和人工流產等問題。相比之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女子的婚前貞潔在當時的社會意識中是神聖至上的，未婚墮胎之事聞所未聞。實際上，當時除了一些特殊情況外，所有的人工流產都是非法的。

戰後幾十年來，人們指望中產階級婦女和（從理論上講）勞動階級的婦女應擔負起專職家庭主婦和母親的責任。早些時候，許多婦女被迫離開「男性」職業，重新回到

「女性」職業中去。儘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國家的婦女在這些「男性」職業中表現突出，成績輝煌，可是男人還是重新霸占了這些職位。但實際上，婦女一直是社會勞力大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戰後的重新建設急需愈來愈多的勞力，其中就包括婦女勞力在內。勞力的不足要從家庭婦女這方面得到補充。這時按性別劃分勞力就不再受到質疑了。大部分婦女被招募承接業餘的外包工（威爾遜，一九八〇），同時也從殖民地（包括美國國內）招收黑人婦女，安排她們在一些有限的職業範圍內工作。在英國，她們在擴大福利事業的單位工作。在這整個過程中，公眾的議論卻始終如一，一再肯定以丈夫養家糊口，妻子依靠丈夫，這樣一種以男人為核心的家庭是最理想的模式。正如威爾遜所提出的那樣，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核心。關於勞動階級婦女參加工作問題的辯論，主要是圍繞在誰來照顧孩子這個問題上，但是：

中產階級婦女提出男女平等的要求，似乎會引起更加嚴重的不安，這種不安最後將轉化為向男人的大男人主義發起挑戰。勞動階級的婦女終歸是受剝削的工人，但對中產階級的主婦來說，工作就是意味著向習俗提出挑戰（一九八〇，P.

「工作的母親」和「未婚的母親」一樣，都是一種不光彩的標誌。這些人遭到指責，人們說她們使孩子們回家進不了門或墮落成少年罪犯。我那守寡的母親也參加了工作。在這些道德規範的恐嚇下，她只好接受慈善機構的恩賜，把我和妹妹送到一所寄宿學校去學習。據說離婚和「家庭破裂」會毀了孩子，但是這一點在離開父母去上貴族學校的豪門子弟們身上並不明顯。過去，婚姻被當作幸福的一種象徵。無數的婦女希望獲得這個幸福，但她们都難以成功，部分原因是……她們那一代的很多男人在戰爭中陣亡了。人們希望婦女們過獨身生活，領取比處境相同的男人較低的工資。這些受人嘲笑的老處女、單身母親（不分黑人白人）、甚至寡婦，在戰後的所謂完美典型家庭裏，是根本沒有立足之地的。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年輕女子，就是按這種高於一切的倫理標準，被分別送進各類學校受教育的，不管這在實際上是何等地自相矛盾。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婦女，她們必須珍視婚前的貞潔，必須把做一個賢妻良母視為自己唯一的天職。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

的婦女婚後參加工作掙錢都被看成是離經叛道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婦女這樣做，會被看成有失身分，並證明她丈夫的無能。此外，勞動婦女的經濟收入被公眾貶為無舉足輕重的「零用錢」。史博克博士、鮑爾比博士和其他人鼓吹戰後的母親要以孩子為中心，而去從事類似外包工這種工作都是大逆不道的。在這種情況下，婦女孤立無援，沒有一個社會階層或團體為她們申張正義。婦女不許走門串戶，不許對強加在婚後母親的社會議論提出反駁。正如威爾遜所說，「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對婚姻作為中心思想和組織思想的重要性強調再三，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這種家庭的幽閉恐怖症的影響所及範圍之外，一位外來的波希米亞人傳來了一個不同的啓示：《第二性》一書以其信心、蔑視的語氣宣稱：婦女的命運還是人為造成，而不是生來俱有的。該書把婚姻描述為一種苦役，並以細膩的筆調，把家務斥責為毫無報償、枯燥無味的重擔，與西昔孚斯（注①）所受的懲罰不相上下。波娃認為：母性並非世人所想像的那種甜蜜蜜的經歷，而是一種痛苦的凝縮，有時甚至是一種災難。該書把胎兒描寫成一種寄生蟲，它剝奪了婦女的獨立自主權；對待受人嘲笑的老處女，波娃的看法則與世俗觀念恰恰相反，她塑造了一個獨立自主的理想婦女，她自謀生計，

不求婚姻，不當母親，不必承受誣篾的風險和禁欲的壓抑。兩性愛情的幸福應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月經初潮前後的心靈創傷和性的甦醒，應該得到公開的討論。羅曼蒂克的愛情以及對男人的感情依附，應該得到同情，特別是同經濟依靠相結合時，更應如此。表面上把婦女奉為大地的母親、大自然的女神，實際上是以此來否定她們作為人的自我認識。把婦女視為附屬物而不是主宰物的男小說家們受到了指責。歷史、政治、法律記載的是婦女的從屬地位，而不是大自然的女神。該書聲稱沒有什麼「女人天性」這一類東西。婦女的命運也當然不是生理特定的；按作者的觀點，也不能以經濟地位和心理條件作為解釋婦女依附性的理由。波娃對這些原因的解釋不清楚，這與婦女一貫被男人視為「不同種類」的觀念是有關的。然而，作者認為婦女不單純是消極的受害者，而且也參與了對婦女命運的擺布；由於對某種更為自由的生活方式熟視無睹，所以她們自己也有信仰不篤之嫌。波娃本人的經歷似乎就可以證明：要選擇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可能的——儘管這在今日的讀者眼裏顯得天真可笑。

七十年代婦女運動開始之前，波娃對舊觀念的詳細駁斥，深受千百萬渙散無組織的婦女歡迎。這些婦女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缺乏集體組織的條件。她一再強調個人的選擇